

January 1934

## 梁任公的中國西化觀

Xu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序經(1934)。梁任公的中國西化觀。《嶺南學報》，3(3)，172-187。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13](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13)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第十一章

## 梁任公的中國西化觀

三十年前嚴幾道因梁任公指摘其翻譯的文字過於古奧，他特地的寫一封信去和梁氏辯駁；但是二十年前在嚴氏寄其友人的書裡，他曾這樣的說：

「任公筆端有魔力，足以動人，自甲午以後，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爲之一聳。」

在民國十八年二月號的小說月報裡，鄭振鐸先生的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我們找出下面一段話：

「梁先生在文壇上活動了三十餘年，從不曾有一天間斷過。他所親炙的子弟，當然不在少數，而由他而始「粗識文字」粗知世界大勢，以及一般學問上的常識的人，當然更不少。……他在文藝上鼓蕩了一支像生力軍似的散文作家，將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文壇，打得個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一種風氣，引導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學問上也有很大的勞蹟，他的勞蹟未必由於深湛的研究，卻是因爲他將學問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聞界上也創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還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一位新聞記者。許多學問者們其影響都是很短促的，廖平過去了，康有爲過去了，章太炎過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響，我們則相信他尚未十分的過去，——雖然綿延了三十餘年；許多學者們文藝家們，其影響與勢力，往往是狹窄的，限於一部分的，一方面的社會，或某一個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響與勢力，却是普遍的，無遠不屆的，無地不深入的，

無人不受到的；——雖然有人未免要諱言之。」

我們以為這位筆端有魔力而影響無遠不屆，無地不深入，無人不受到的梁先生，不但是在他生時的三十餘年裡找不出一位像他一樣的人，就是三十餘年前的中國的歷史上，以及他死以後，我們想找一位像他一樣的人，也不容易。

然而所謂筆端有魔力，足以動人，不過是梁先生的偉大的工具；所謂其影響無遠不屆，無地不深入，無人不受到，乃是梁氏的偉大的結果。梁氏之偉大的本身，和他的最大的貢獻，照我看起來，乃是他的西化的主張。

本篇的目的，是要將梁氏的西化主張。加以介紹。但是在未說明他的西化的主張以前，我們且先把他個人的傳畧，畧為介紹。

梁氏於三十歲時，曾寫過一篇三十自述，到了民國九年，他寫了一本清代學術概論，裡面的二十五及二十六節，是說他個人的學術及傳略，這可以說是他的四十六自述。梁氏享年五十六，他在五十六年內所見聞和所做的事情很多，然大略來說，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由小至識康有為。（一八七三至一八九一）第二個時期是從識康有為至逃避日本。（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八）第三個時期是從逃避日本至民國元年。（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一）第四個時期是從民國元年至他壽終為止。

關於他第一時期的事蹟在他三十自述裡他說：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余尤甚。……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畧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為文，九歲能

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鑽研，顛顛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鑑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者八九。父執友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十五歲時，肄業於省會之學海堂。堂爲嘉慶間前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詁詞章課粵人者也。至此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己丑年十七舉於鄉，主考爲李尙書端棻，王鎮江仁堪。年十八計偕入京師，父以其穉也，挈與偕行；李公以其妹許字焉。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畧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關於第二個時期，他的自述說：

「其年秋（時年十八）始交陳通甫，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材生聞。既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爲我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牀，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

平知有學自茲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爲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余與諸同學日割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師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六月日本戰爭起，惋惜時局，時有所吐露，人微言輕，莫之聞也。願益讀譯書，治算術地理歷史等，明年乙未，和議成，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既而南海先生，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余亦從其後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師強學會發起之者爲南海先生，……余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爲言官所劾，會封禁，而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餘日盡瀏覽之，爾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

梁氏本以述作而著名，然而述作的重要動機，是由於他之瀏覽譯出西書而來，其實這種動機，是一步一步的發展而來的。他曾說過，他十八歲由京師道過上海，讀瀛環志略，始知世界五大洲各國，以及喜閱譯出書籍，後來他又從康有爲而旁聽到世界各國的學術，政治歷史，然而這個時候，還沒有述作之志。是甲午戰後，他始特別注意到譯出西書，他既因爲瀏覽西書而有述作之志，他於次年（丙申）又應黃公度之招，到上海辦報，這就是他所主撰的時務報；時務報的發現，可以說是梁氏述作之志的實現的開始，他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西學書目等。他「批評稅政，而救敵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亦時時發民權論，但微引其緒，未敢昌言」。

到了次年，他被請到湖南講學，他在清代學術概論裡說：

「已而嗣同與黃遵憲熊希齡等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啓超主講席，唐才常等爲助教。啓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課以割記；

學生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鐸稱高才生焉。啓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掄擊無完膚。」

到了戊戌年，他因康有爲之得用於光緒，而也被召見參預新政。後來政變，六君子被殺，啓超也於八月亡命到日本，而入上面所說他的傳略的第三時期。

他到日本後兩個月：和橫濱的華僑商界們，籌辦清議報及設大同學校於橫濱。他這一次在日本有了一件最可記的事，就是習讀日文。他既能閱日文，他對於西洋各國的學術書籍之爲日人所介紹和翻譯者，均能大概了解。因此智識上既有無限的進步，思想上遂生出很大的變化。他在三十自述裡說：

「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爲之一變。」

從己亥（一八九九）至辛丑（一九〇一）兩年裡，也曾到檀香山、南洋羣島，及澳洲等處，他在三十自述裡說：

「其年（一八九九）在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國維新會之設，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間美洲人招往遊，應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島，其地華商二萬餘人，相繫留焉，因暫住焉，創夏威夷維新會，適以治疫故，航道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義和團變已大起，內地消息，風聲鶴唳，一日百變。已而屢得內地函電，促返國，遂回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聞北京失守之報。七月急歸滬，方思有所効，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傅諸烈，先後就義，公私皆不獲有所救。留滬十日，遂去。適香港。既而渡南洋，謁南

海，遂道印度，游澳洲應彼中維新會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東，環洲歷一週而還，辛丑四月，復至日本。」

他在日本時，既因能讀日文而使其思想變化，他這兩三年來，又因到了海外各處遊歷，得了不少的經驗。這些經驗，有些像西洋人之對於殖民地之經營和設施，使他對於西洋人的毅力，和西洋人的文化，生了不少的羨慕；有些像華僑之到處受人苛待，使他生了不少的悲痛；有些像華僑之對於救國的熱忱，使他生了不少的興奮。這些興奮，悲痛，羨慕，對於他後來的思想和著作上，有了不少的影響。

實際上的政治活動已成泡影，以感情豐富，思想發展的梁氏，遂矢志於文字上的鼓吹。梁氏的文字，正像嚴復所說，原自暢達有魔力，能動人，現在又因能讀日文而增廣其智識範圍；因失敗遊歷而衝湧其情感，於是梁氏的著作的數量的方面，因之而增，著作的影響，因之而大，著作的精華，也因之而成。他在清代學術概論裡說：

「自是啓超復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

我們一翻閱新民叢報，每期至少有十萬言，月出一冊，裡面文章，十九乃由梁氏自寫，平均每日至少要寫五六千言；怪不得人們都說梁氏乃一位多量的著作家。為梁氏編飲冰室文集的何天柱氏在飲冰室文集序裡告訴我們道：

「今年夏（光緒二十八年）入江戶，一省視先生，每日所撰述，日必五六千言，乃至萬言，而賓客之應酬，函牘之往來，其雜沓繁劇，已復非二三人之力所克任，而先生處之，綽綽若有餘裕焉。猶復讀書有定課，日必盡數卷，蓋其精力殆有非尋常人所能擬議者；毋亦其熱誠驅迫之，而自忘其瘁也。」

這種的魄力，正像何氏所說，「雖欲從之，而未由也矣。」

我們曾說過，這個時期的梁啟超，不但是位多量的著作者；而且他的著作的精華，也可以從這個時期裡找出來。因為這不但是梁氏一生的思想最發達的時期，就是把整個中國的思想界來看起來，梁氏還是居於最高峯的地位，所以何天柱又說道：

「今日中國學界之進化，一視乎先生識想之進化，先生數年來之文，即中國數年來文明程度之表記也。」

至於梁氏的著作之影響於國人的深切，除了上面已說明外，我們現在且舉出一個例子來證明：

「漢年十四五以訖十八九間，留心時事，嚮志事功，讀新會梁氏所為新民說，德育鑑輒為日記，以自勉勵。……公（按指梁漱溟氏的父親）固關懷國家，漢亦好論時事，於是所語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舊風俗之間。始在光宣間，父子並嗜讀新會梁氏書。漢日手新民叢報，若國風報一本，肆為議論，顧皆能得公旨。」（梁漱溟州後文錄思親記）

其實梁氏，在這個時期的著作的影響於學者及青年之像梁漱溟者，指何勝屈。我們回想三十年來所謂學者名士之對於梁氏的主張，固未必盡與同者；然而若說沒有受過梁氏的影響，恐怕是找不出來罷。

梁氏居留日本有了十餘年，中間除了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九兩年中，少有著作外，其餘的十年左右，著作都很豐富。我們現在翻閱中華書局刊行乙丑重編八十本的飲冰室文集，以及其他的著作，大多數都是在這個時期寫作的。所以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梁氏一生的最重要的時期。

從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八年，梁氏曾在政治舞場上活動過好多次。



他最初（一九一三年）做過袁世凱任內的司法總長，在段祺瑞當政時（一九一七年）又做過財政總長。梁氏在湖南當時務學校教席時，曾提倡革命，初到日本時，也有這種思想。但是因和康有為的關係，故在第三個時期中，始終是一位保皇黨的健將。民國以後，他不但對於所謂帝制復辟不加贊同，還且激烈反對。在袁氏要稱帝的時候，他曾備嘗辛苦，去參加護國軍之役。又在張勳復辟的時候，他也極力反對。所以從政治的意見方面來看，在民國時代的梁氏，比之在日本時代的梁氏，已進一步。但是在思想的整個方面來看，在民國時代的梁氏已不若在日本時代的梁氏之積極和澈底。他在民國四年七月的大中華雜誌裡所發表的復古思潮平議，及戰後遊歐所做的歐遊心影錄都可以說是他的思想之不積極和不澈底的表徵。

原來梁氏正像他自己所說，「太無成見，務廣喜新，」他到日本後，由讀日文而覺得西洋學問之深博，文化之優高，故極力主張西化。可是不懂西文而講西化，正像他自己所說，來源淺澁，汲而易竭。同時又因歐洲戰爭蔓延數年，免不得令他生出一種反响的思想，而懷疑西洋文化。所以在他的思想的整部來看，梁氏在第四個時期裡，可以說是沒有第三個時期裡那樣積極和澈底。

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抹煞梁氏在這個時期裡在學問方面的貢獻。他的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佛學史等名著，都是在這個時期裡成就的。所以在思想上，梁氏也許是趨於支細滅烈，然而在學問上，他始終是一座高峯，一個柱石。

梁氏晚年，因為外界的激刺和內部的淺澁，而致思想上起了多少變化，然在志望上他始終是想做一位思想界的先鋒。他在清代學術概論裡曾這樣的告訴我們：

「啓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為無限制的盡量輸入，斯固

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爲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啓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就此點論，梁啓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雖然，國人所責望於啓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爲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爲一大損失也。○」

我們在這裡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新思想界的陳涉的梁啓超和在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的梁啓超，但是要在新思想界闢出一個田地，不能不先對於舊思想界施以攻擊；這種消極的破壞的工作我們可以從梁氏下面數段話見之。

「我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而思想一窒，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教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爲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寢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群獫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羣嫗得一錢，詬詈以相奪，情狀抑何可憐，

……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生之結果也。」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蓋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徧索諸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爲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者真理之終不能餉我國民也。故吾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

這是從梁氏在壬寅年（一九〇二）新民叢報所發表的保教非所以孔論抄出來，梁氏曾在清代學術概論裡重述，且加以下面的解釋：

「此諸論者，雖專爲一問題而發，然啓超對於我國舊思想之總批判，及其所認爲今後新思想發展應遵之途徑，皆略見焉。」

中國的思想之缺點既如此，中國的文化之其他方面之缺點，又如他在丙申年（一八九六）的時務報，所發表的變法通議裡所說：

「地利不關，人滿爲患，河北諸省，歲雖中收，猶道殣相望，京師一冬，死者千計。一有水旱，道路不通，運賤無術，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濱海小民，無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諸地，鬻身爲奴，猶被驅迫，喪斧以歸，馴者轉於溝壑，黠者流爲盜賊；教匪會匪，蔓延九州，伺隙以動；工藝不興，商務不講，土貨日見減色，而他人投我所好，製造百物，暢銷內地，漏卮日甚，脂膏將枯。學校不立，學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據詞章，破碎相尚，語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難，治生無術，習於無恥，嘗不知怪。兵學不講，綵營防勇，老弱癯煙，兇悍騷擾，無所可用。……官制不善，習非所用，委

權胥吏，百弊蠅起，一官數人，一人數官，牽制推諉，一事不舉；保獎朦混，鬻爵充塞，朝爲市儈，夕登顯秩，宦途壅滯，候補窘悴，非鑽營奔競，不能療饑；俸廉微薄，供億繁浩，非貪污惡鄙，無以自給，限年繩格，雖有奇才，不能特達，必候其筋力既衰，暮氣將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庭，而乏才爲患。

○法敝如此，雖敵國外患，晏然無聞；君子猶或憂之，況於以一羊處群虎之間，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者乎。」

中國的思想之固塞，地利之不關，工藝之不興，商務之不講，學校之不立，兵學之不識，官制之不善，政治之腐敗，既若此之甚，則除舊布新，乃是刻不容緩的急務；而所謂除舊布新，就是他所說的變法。所以他說：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關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所敢言矣。」（變法通議）

所謂新法，乃是西法，且看他說：

「泰西治國之道，富強之原，非振古如茲也。……蓋自法皇拿破侖破命倡禍以後，歐洲忽生動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舊俗，則視今日之中國無以遠過，惟其幡然而變，不百年間，乃淳然而興矣，然則我所謂新法者，皆非西人所固有，而實爲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與改而施之東方，其情形不殊，蓋無疑矣。況蒸蒸焉，起於東土者，尙明有因變致強之日本乎？」（全上）

然而變法要全部和澈底的變，始能有效；這一点他在戊戌政變原因答客難一文，說得很透澈。

「中國之當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也。……我中國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西學堂也，……夫此諸事，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則不變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聽之使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所爲，於中國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體段亦甚複雜，枝節之中，有根幹焉，根幹之中，又有總根幹焉；互爲原因，互爲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椽棟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廝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廝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彌縫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厦，別紐新製，烏乎可哉。……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

總而言之，梁氏不但是反對滿洲黨人的頑固閉塞，沿舊蹈常，而

且反對李鴻章張之洞之溫和改革，所謂沿舊蹈常是復古，所謂溫和改革是折衷。復古固是徒增其弊，折衷也不外是學「人皮毛之皮毛」，結果也只有害而沒有益。這兩條路既通通跑不去，唯一的辦法，是澈底和整個的西化。所謂變甲要先變乙，變乙又要先變丙，所謂速變全變，就是這個意思。

梁氏不但是反對李鴻章張之洞之徒事於效法西洋的皮毛的物質文化，他還進一層而主張採納西洋精神文化為首先急務。在壬寅（一九〇二）年的新民叢報所發表的國民十大元氣論一文裡，我們找出下面一段話：

「今所稱識時務之俊傑，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國也，欲進吾國使與泰西各國相等，必先求進我國之文化，使與泰西文明相等，此言誠當矣。雖然，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然則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覺自任者，於此二者之先後緩急，不可不留意也。」

他又說：

「游於上海香港之間，見有目懸金圈之鏡，晝乘四輪之馬車，夕噉長桌之華宴，如此者可謂之文明乎？決不可。陸有石室，川有鐵橋，海有輪舟，竭國力以購軍艦，糜民財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謂之文明乎？決不可；何也？皆其形質也，非其精神也。求文明而從形質入，如行死港，處處遇窒礙而更無他路可以別通，其勢必不能達其目的，至盡棄其前功而後已。求文明而從精神入，如導大川一清其源，則千里直瀉，沛然莫之能禦也。」

平情來說，這種議論，到了現在能言之者還是不易找出。二十年

前的鼓吹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們，固不待說，二十年來所謂中國的物質文明，固比不上西洋，而其精神文明，却優過西洋的人們；看了梁氏這種見解，恐怕也要退避三舍。然而最可惜者，就是梁氏自己二十年來，對於三十年前的主張，也因了歐戰的原故，而大起懷疑，大聲疾呼，要我們一般青年立正，開步走，去提倡中國的精神文化；這也許是由於梁氏太無成見，太易變化；也許是由他像他所說固有之舊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澆，汲而易竭。因爲這個原故，我們在本章所解釋的梁氏，大概是二十年前的梁氏，雖則民國以後的梁氏，像我們上面所說，也有他的偉大處。

梁氏既相信精神文明是本源，物質文明是枝葉，他又相信理論比事實猶爲重要，所以他說：

「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實事；理論者，實事之母也。……理論亦有二種：曰理論之理論，曰實事之理論。理論之理論者，又實事理論之母也。……兩者亦有優劣乎？曰，無也。理論之理論，其範圍廣遠，其目的高尚，然非有實事之理論，則無以施諸用；實事之理論，其範圍繁密，其目的切實，然非有理論之理論，則無以衡其真。二者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欲以理論易天下者，不可不於此二者焉並進之。」（新民議叙論）

新民叢報之刊行，新民說新民議之著作，都是本着理論乃事實之母的意旨，且看他說：

「余爲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原，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實理論之理論中，最粗淺且空衍者也，抑以我國民今日未足以語於實事界也。雖然，爲理論者，終不可不求其果於事實，而無實事之理論，則實事終不可得見。今徒痛恨於我國之腐敗墮落

，而所以求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豔羨他國之發達進步，而所以躡而齊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國民今日最切要之問題也。」

一方面要明白自己的病症所在，一方面要努力效法西洋躡而齊之，是中國的切要的問題；所謂新民，不外是新中國之民，而使其齊立於發達進步的西洋文化。我們試一翻閱梁氏在他的第三時期裡的著作，而特別是庚子以後的著作，介紹西洋文化的理論，可以說是他的最大的職志。他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獨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險，進步，尚武，愛國等論，通通都是西洋民族的德性。他的羅蘭夫人傳，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匈加利愛者噶蘇士傳，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可以說是新民的模範。他的日本併吞朝鮮記，越南亡國史，是新民的殷鑒。他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學說，天演論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法理學大家孟德司鳩之學說，盧梭學案，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等等，都是西洋文化的精神方面的表徵，和西洋文化的事實之母。他自署為中國之新民，他——簡單來說——是要個個中國人都要達到西洋文化的水平線的新民。

不但這樣，他對於中國學術的整理的貢獻的功績，無論是誰都要承認的。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等著作，現在看起來，也許很為平常，然在三十年前的中國的學術界看起來，却是開山之作，首創之舉。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等，還最好的著作。然而這些的貢獻，完全是由於運用西洋的治學的方法來整理我們的舊東西。「於是乎昔人絕未注意之資料，映吾眼而忽瑩，昔人認為不可理之系統，經我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語句，旋吾腦而忽暢。」總而言之，他以為我們的國故之在最近數十年來之所以能逐漸復活，是依賴於這些洋貨以為研究的



利器和工具。

可知梁氏之所以爲梁氏，不但是由於他能覺到西法之不可效，而且由於他能明白中國的國故之能夠整理，也不能不依賴於西法。